

# 目录学视野下古代饮食著述考略

付明易, 田富军

(宁夏大学 人文学院, 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 从宋代尤袤《遂初堂书目》始设“谱录”一类,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谱录”类的成熟与稳定,古代饮食类著述在古典目录中的分类经历了一个从混乱到统一的过程。饮食类著述主要分布在子部农家类、医书类和谱录类之中,经历了由史部到子部的发展与变化;其分类的细化与稳定代表了饮食学的逐渐独立;各时代饮食著述的编纂异中有同。

**关键词:** 目录学; 饮食; 分类; 子部

中图分类号: TS 97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730(2018)01-0019-05

中国拥有悠久的饮食文化。甲骨文中记载了大量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内容,出现了一些粮食作物的名称,如黍、稷、稻、麦等;见诸于青铜器上的金文是记载饮食文献的又一重要载体,《金文编》中有相当数量的与饮食有关的资料。先秦典籍如《诗经》《周礼》等文献中也有许多与饮食相关的内容。这些文献记载为我们了解古代饮食风俗和食物种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文献”一词涵盖面甚广,本文以“饮食著述”为研究对象,相较于“饮食文献”而言,更强调其独立性和专门性。饮食专书的出现代表着饮食文化走向自觉和独立,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不涉及附着于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和类书、笔记等文体之内的饮食书写,也不包括如《说文解字》《释名·释饮食》一类包含饮食名物训诂一类的字书,而是指其目录分类主要归类于子部文献范畴之内,内容涵盖食物烹调方法或阐述食材食疗价值的独立著述。笔者试通过目录学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使命和功能,对饮食著述的发展脉络和目录分类进行系统客观的梳理。

## 1 学术史梳理

有关中国饮食史或饮食文化的研究成果较多。法国学者萨班于2013年发表的《近百年中国饮食史研究综述(1911-2011)》对中国及国外的

有关中国饮食史的研究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以断代的形式对每个时期出版的整理丛书、研究著作进行了介绍。有关饮食史的研究,在21世纪之前都倾向于简单的历时性阐释,自2000年以后,学界研究转向更深更细的方面,研究方法也从单一的历史梳理逐渐转向从语言学、文献学、统计学等诸多角度进行切入,但是对于古代饮食文献在目录学中的分类问题尚未有专门文章涉及。

2011年后出版的通史类饮食研究著作更具有系统性。如2012年出版的姚伟钧等合著的《中国饮食典籍史》,第一次系统地梳理了先秦以来的考古资料和典籍记载在内的几乎所有与饮食有关的文献,以朝代为限,除先秦文献外,其余朝代文献均按内容或文体而非传统四分法进行分类,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将文献类目细化,使得各类文献都能囊括其中。但其值得商榷的地方在于:各类之间存在交叉现象,如专门饮食典籍与食经类无法完全独立;各朝代之间类目不存在统一性的划分,宋代的茶书类和酒书类至明代便合为一编为茶酒类。《中国饮食典籍史》的分类为饮食著述的目录流变问题提供了主要的对比和参考。

除著述外,一些论文对古代饮食典籍及其分类也有关注。其一是对饮食文献进行断代研究。戴云的《唐宋饮食文化要籍考述》将唐宋时期相关文献分为食经类和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类(饮食

收稿日期:2017-12-20

作者简介:付明易(1993-),女,河南洛阳人,宁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

田富军(1973-),男,回族,宁夏灵武人,宁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和地方文献研究。

部分)其中第二部分内容有些繁杂,将类书、医书等混为一类,分类不够明确。熊莎的《清代食养文献研究》专注于饮食养生一类文献研究,在其“清代食养文献分类概述”部分,将此大类文献分为饮食专著、食养著作、养生专著、其他文献中的食养资料四类,各类所列文献多按现代人的观念进行划分,存在交叉重合之处。其二是对某一类型的饮食文献及其分类有所涉及。苏恒安的《明末救荒野蔬编纳入家庭菜谱之探讨》对明代野菜野蔬类文献进行了分析,为我们研究古代目录中常处于子部农家类或医家类的救荒之作和野菜谱录专书的后期分类发展提供了启发。陈晓迪的《食疗类本草古籍的历史考察》将医书类本草文献与饮食类文献结合考察,但其重点在于探究饮食的医疗养生作用,故其所引文献如《食性本草》《日用本草》等按四部分类法划分多属于子部医书类。邵万宽的《对我国现存古代食谱编写情况的研究》对古代的一些饮食类文献做了简要分析。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食谱”这一概念“应该有原材料(数量)、制作方法(包括成菜特点)”<sup>[1]</sup>,因此他将包括《齐民要术》在内的一些涉及具体食材做法的文献做了简要概括,并没有包括《茶经》一类以“饮”为主的文献,可见其“食谱”的概念是现代意义上的定义,而未能全面概括古代饮食文献。其三是对某一单本古代饮食著述的介绍。如高澔彤的《〈饮膳正要〉研究》、李秋芳的《黄云鹄〈粥谱〉及其价值》,这些单部文献的研究性文章其内容更有广度和深度,为我们全面了解饮食著述在古典目录中的归属提供帮助。

## 2 古典目录中的流变

饮食类著述的发展经历了从汉至唐的萌芽、宋代的发展、元明时期种类的丰富到清代以降分类趋于稳定的过程,它在古典目录中的流变错综复杂,但也有规律可循。

### 2.1 从汉至唐——萌芽期

饮食类著述在古典目录中的记述最早可追溯至《汉书·艺文志》。《汉志》承刘歆《七略》采用六分法,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略,其中方技略之下的经方类载有《神农皇帝食禁》七卷。所谓“经方”,《汉志》称其为“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sup>[2]</sup><sup>1778</sup>,因此书已亡佚,无法窥其全貌,清人严

可均所作《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对此书有介绍“经方家有《神农黄帝食禁》七卷,《周礼·医师疏》引《食禁》作《食药》。神仙家有《神农杂子技道》二十三卷,独《本草》不见,见《平帝纪》及《楼护传》,盖《食禁》《食药》即《本草》矣。”<sup>[3]</sup>后世有“食疗本草”一类的著述,此书大抵开其先河。

《隋书·经籍志》成书于唐贞观时期,其目录分类已采用经、史、子、集的四分法,在子部的医方类中开始出现了相当数量的“食经”类著述,如《神仙服食经》《崔氏食经》《淮南王食经》等书,也有一些专门类的饮食制作之法的书出现,尤其是酒类的酿造。《隋志》所载《四时御食经》之下有注,言梁朝时有《家政方》十二卷,包括《四时酒要方》《白酒方》《七日面酒法》等,这些著述的兴起与魏晋时期道教的兴盛和当时名士特殊的饮酒、服药风气是密不可分的。

五代时期编纂的《旧唐书·经籍志》沿袭《隋志》的分类方法,在子部医书类收录了与饮食有关的著述,与《隋志》所记几乎无异。值得注意的是,在其分类之后的小序特提出“食经十家”,说明“食经”这一著述类型已成规模,也代表着饮食类著述开始自成一统。《新唐书·艺文志》成书于宋代,除了在其子部医书类仍然记载有关《食经》《食次》一类的著作外,也出现了唐代孟诜所撰《食疗本草》一书,此书第一次提出了“食疗”这一概念,对后世食疗类著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代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介绍茶的专著——陆羽所撰的《茶经》,《新唐书·陆羽传》言“羽嗜茶,着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sup>[4]</sup>《新唐书·艺文志》的子部小说类收录了《茶经》和唐代张又新的《煎茶水记》,实继承了《隋志》对小说类的看法。《隋志》小说类序言“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sup>[5]</sup>所以将《茶经》一类列入小说类,实从其关注的角度来说,因为茶道尚未宏远,在当时还处于未流。

### 2.2 宋代——成熟期

宋代饮食类著述的类型更加丰富,果蔬类专书数量增加,“食经”作为一个独立的门类在目录分类体系中出现。北宋王尧臣等所撰《崇文总目》为宋代第一部公藏目录,继承《隋志》的传统,将《茶经》《煎茶水记》《茶谱》等书纳入小说家

类,在其子部医书类收入《养身食法》《食医心鉴》《萧家法饌》《侍膳图》等书。南宋晁公武所撰《郡斋读书志》将《茶经》《酒经》一类纳入子部农家类。陆羽所作《茶经》带动了与茶有关的著述的兴盛,宋代的丁谓、刘异、蔡襄甚至宋徽宗都纷纷著述,这与当时文人社会的风雅之趣有密切的关系。除此之外,当时也出现了一些果蔬类专书,如蔡襄的《荔枝谱》、宋僧挚宁的《笋谱》等。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題》子部农家类所收著述涉及的物种更加丰富,如南宋王灼的《糖霜谱》,是“古代第一部关于制造冰糖的专著”<sup>[6]</sup>,对于研究宋代制糖工艺有着很大的文献价值;还有北宋傅肱的《蟹谱》以及高似孙的《蟹略》等;子部医学类有宋代娄居中所撰的《食治通说》,其主旨在于通过食疗达到医治的目的;原列入农家类的《茶经》《酒经》一类著述被纳入杂艺类,这说明在当时谈茶饮酒已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和生活艺术,文人雅士的文学创作中也多涉及茶事酒事,如黄庭坚善于将禅宗思想融入茶之中“斋余一碗是常珍,味触色香当几尘。借问深禅长不卧,何如官路醉眠人。”<sup>[7]</sup>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子部创设“谱录”一类,此后《四库全书总目》亦沿用此例,四库馆臣评价其“于是别类疏名,咸归统摄,此亦变而能通矣”<sup>[8]981</sup>,将《茶经》《茶谱》《酒谱》《笋谱》等都纳入其中,强调“以类相从”,注重专门之学问。

南宋郑樵所撰《通志·艺文略》与以往记录一朝藏书情况不同,它注重“会通”的观念,“今所纪者,欲以纪百代之有无”<sup>[9]</sup>。因此无论书籍是否亡佚,只要历代史籍有所记载,就会被收入其中。《通志·艺文略》摒弃传统的四分法,采用十二分法,使用三级类目,因此分类详尽。饮食类著述在其诸子类道家的“服饵”“修养”;史部食货类的“种艺”“茶”“酒”;医方类的“食经”等部分有所收录。这是目录学史上第一次将“食经”作为一个独立的门类予以列出。元代马端临所修《文献通考·经籍考》和脱脱等所修《宋史·艺文志》对于饮食类著述的分类采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将茶、酒、果蔬类皆列入子部农家类,将食疗类纳入子部医家类,这种做法实乃上承历代史志目录的分类方法。《文献通考·经籍考》子部农家类前有引《宋三朝国史艺文志》的小序“殖物宝货著谱录者,亦佐助衣食之源,故咸见于此。”<sup>[10]</sup>其农家类目下不仅涵盖与农耕有关的书籍,凡是与衣

食有关皆可纳入,这与《汉志》农家类小序所言“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sup>[2]1743</sup>有异曲同工之处。

### 2.3 元明时期——丰富期

明代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开断代书目之先河,主要对有明一代的文人著述进行著录,又对宋元时期未被著录的著述进行补充,内容丰富。饮食类著述主要被收录在以下三类之中:其一,史部食货类收录了大量饮食类专书,包括茶、酒类著述,如冯时化《酒史》《酒经》、田艺蘅《煮泉小品》;专门类饮食著作,如韩奕《易牙遗意》《续易牙遗意》、曹蕃《食品记》等;果蔬谱录类,如屠本峻《闽中荔枝谱》八卷、丁雄飞《蕉史》《樱桃会》等。宋元时期比较著名的饮食类著作也被补充进来,如宋代陈达叟的《本心斋蔬食谱》,元代忽思慧《千顷堂书目》误作“常普兰奚”)所撰的《饮膳正要》等。其二,子部农家类出现了一些救荒类著作,如周定王的《救荒本草》,其下有小注,言“庶草蕃芜,可多佐饥馑。”<sup>[11]</sup>与之相关的出现了野菜类的著述,如王磐《野菜谱》、鲍山《野菜博录》、周履靖《茹草编》等。其三,子部医家类涵盖的著述多秉承“食疗本草”的发展脉络,如宁源《食鉴本草》、汪颖《食物本草》等。《明史·艺文志》继《千顷堂书目》发展而来,仍记一代之著述,《明志》在目录分类上做了一些调整,比如将子部医书类与艺术类合并,统称“艺术类”,使得一些原属于医书类的本草类著述也被纳入至艺术类,子部农家类收入了《救荒本草》《茹草编》等著述,与《千顷堂书目》相比,《明志》删去了一些饮食类专著,收录书目数量较少。

### 2.4 清至当代——稳定期

清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卷帙浩繁,广收天下遗书,各级目录分类至此趋于稳定成熟。其子部农家类上袭《千顷堂书目》《明志》之体,也收录了与救荒有关的饮食类著述,而原来经常被收入的茶酒类著述,还有菜蔬谱录之类,都被并入谱录类之中。《四库全书总目》十分强调农家“本业”之名“茶事一类,与农家稍近,然龙团凤饼之制,银匙玉碗之华,终非耕织者所事,今亦别入谱录类,明不以末先本也。”<sup>[8]852</sup>《四库全书总目》谱录类是从宋代尤袤《遂初堂书目》发展而来的,其类目小序言“惟尤袤《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于是别类疏名,咸归统摄。此亦变而能通矣。今用其例,以收诸杂书之无可系属者,门类

既繁,检寻亦病于琐碎,故诸物以类相从,不更以时代次焉。”<sup>[8]981</sup>谱录类下设三类,其中将茶酒类著述和《糖霜谱》收入食谱类。有关“食谱”这一概念的阐释,四库馆臣认为,像《齐民要术》中所涉及的烹饪之法是日常饮食的内涵,“至于天厨珍膳、方州贡品,连而入之,则非农家所有事矣”<sup>[8]990</sup>,所以食谱类中所收之书都为饮食专书,有内容相涉者应考其具体的内容和性质再选择类目。果蔬类著述,如《橘录》《笋谱》《菌谱》《蟹谱》等皆纳入草木鸟兽虫鱼之属。

《四库全书总目》谱录类存目中也有相当一部分饮食类著述,这与四库馆臣的编纂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杜泽逊先生曾列出书籍被列入存目的原因,共有九种,<sup>[12]</sup>其中“贵远贱近”“著作水平庸劣或伪妄”两条颇能解释一部分饮食著述被列入存目之中的原因。如食谱类中所收皆为唐宋之人著述,存目中所收皆为元明以后的著述,其原因大多为“姑以寄意而已,不足以资考核也”<sup>[8]1000</sup>(明陆树声撰《茶寮记》);“然编次错杂,殊乏体裁”<sup>[8]1001</sup>(不著撰人《酒部汇考》)等,四库馆臣以为其价值不高,但是这些著述对于我们今天了解古代饮食文化仍具有意义和价值。另外,在子部医家类也有少量食疗养生类著述,其“养生”之类从原归属于经方、道教一派的升仙之书慢慢向务实治病的方向演进,以“食治”为主,这与清代崇尚实学的风气也有极大关系。此后清代的一些私家书目,如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丁氏《八千卷楼书目》、孙殿起《贩书偶记》以及民国时编纂的《清史稿·艺文志》等都沿袭《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方法,在谱录类之下设“食谱”或“饮馔”一门,饮食类著述的分类渐渐固定下来。

当代的一些目录书籍,如《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国古籍总目》等,也沿用这样的分类方式,更采用四级分类法,使分类更加详细科学。《中国古籍总目》在子部谱录类饮食之属下又分总论、合编、粥、调味、茶、酒等,医家类本草之属又分出食疗本草一类,将饮食类著述按照不同的内容分门别类,各安其所。

### 3 结语

饮食著述的分类经历了一个从混乱到统一的过程。茶酒类文献的类目归属在子部小说类、杂艺类、农家类、谱录类,以及史部食货类等类目之

间转换;而饮食总论类文献则是从子部医方类逐渐被归属于谱录类的;果蔬类文献发端于宋代,最初也被归于农家类,其后因种类繁多,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以类相从,归于谱录类,并设草木鸟兽虫鱼之属;其他偏重于食疗、养生一脉,以及与饮食颇有渊源的著述则始终归于医家,虽然间或归于道教或经方之中,但随着后世崇尚实学,反对修仙之说风气的出现,这类修仙之作渐渐亡佚或不被收入主流目录书中;以农耕为主,但其篇章涉及饮食方法之书,或出于救荒的目的对可食用动植物进行普及性的著述则一直被归于子部农家类之中。古典目录分类中谱录一类虽然最初发端于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但在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得到沿袭和采用,直到《四库全书总目》才得以正名,“于是别类疏名,咸归统摄”。谱录类目的食谱类或草木鸟兽虫鱼类的著述又可理解为研究某一专门领域或事物的专科性书籍,如研究食物的制作方法和食物的特性,研究某一可供食用的动植物的种植、制作等方法,这类专科性书籍被划分子部谱录类之下,实际在一定意义上具备了现代科技思想,生产分工更加明确,随之带来的图书分类也更加明确。

饮食著述的发展具有时代性。虽然古代目录学著作存在着各种问题,《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序》中将其归结为“一曰偏见太深,二曰体例不纯,三曰重复相糅,四曰错谬丛生,五曰漫无论次”<sup>[13]</sup>,但是这些目录学著作仍然是我们窥探古代藏书情况的第一手资料,由此可以了解各个时代不同的社会风貌和饮食风气。宋代饮食类文献倡导一种清疏之风,尚素食。林洪所撰《山家清供》,多以素食入馔,如“梅花汤饼”,以白梅与檀香末浸水和面,再印出梅花样的小饼,最后煮过放入鸡汤之中,十分具有文人雅趣。宋陈达叟的《本心斋蔬食谱》,此书也多言清淡饮食,倡导君子之习,这种饮食风气与宋代整体的文人风貌颇有契合之处。明代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远高于其他朝代,由此带来的明代荒政的发展,一些救荒类著述应运而生,明太祖第五子朱橚的《救荒本草》,“疏其花、实、根、干、皮、叶之可食者,汇次为一帙”<sup>[14]</sup>,以图录和文字结合的形式对植物可供食用的部分分别介绍,并附简单的烹饪做法,使得在荒年百姓可以借此图录找到可以充饥的植物,起到救荒的作用。

饮食著述的书写具有因循性。饮食著述主要围绕着养生类、食疗类、救荒类、食谱类、动植物类、茶酒类进行撰写,内容大多不出其类。如茶类文献,自唐代陆羽所撰《茶经》之后,各类与茶有关的著述层出不穷,但很多没有新意,如明代何彬然所撰《茶约》一卷,四库馆臣评价其“略效陆羽《茶经》之例”<sup>[8]1000</sup>;明代田艺蘅撰《煮泉小品》,又因“大抵原本旧文未能标异于《水品》《茶经》之外”<sup>[8]1001</sup>被列入《存目》之中。此外还有宋代傅肱的《蟹谱》,其后高似孙又模仿其体例作《蟹略》等。这些内容、体裁相似的著述被不断撰写的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补前人之未及。元代忽思慧所撰《饮膳正要》是一部向皇上进献的养生类食疗著述,其书前附《进书表》一则“是以日有余闲;……《本草》有未收者,今即采摭附写。”<sup>[15]</sup>是书集各类《本草》著述之所长,更有所增删,补前代之不足。其二,文人风气使然。孔子曾言“君子食无求饱”,追求简单饮食自宋朝起渐渐成为一种文人风尚,元代倪瓚所作《云林堂饮食制度集》中曾言“烹饪和湑,既不失其惨毒,而蔬素尤良。百世之下,想见高风。”<sup>[16]</sup>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各类素食菜谱层出不穷,蔚为大观,如宋代林洪《山家清供》、宋代陈达叟《本心斋蔬食谱》、清代薛宝辰《素食说略》等,这些素食菜谱既体现出作者的饮食情趣,也符合中国古代饮食著述所崇尚的养生观念。

#### 参考文献:

- [1] 邵万宽. 对我国现存古代食谱编写情况的研究[J]. 农业考古, 2016(6): 216-220.
- [2]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4.
- [3] 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9.
- [4] 欧阳修, 宋祁. 新唐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5612.
- [5] 魏征. 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1012.
- [6] 姚伟钧, 刘朴兵, 鞠明库. 中国饮食典籍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210.
- [7] 黄庭坚. 山谷诗集注[M]. 任渊, 史容, 史季温, 注. 黄宝华, 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1300.
- [8] 永瑢.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 [9] 郑樵. 通志二十略[M]. 王树民,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55: 1806.
- [10] 马端临. 文献通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773.
- [11] 黄虞稷. 千顷堂书目[M]. 瞿凤起, 潘景郑, 整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331.
- [12] 杜泽逊. 《四库存目》书探讨[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5): 48-53.
- [13] 洪业, 田继综. 食货志十五种综合引得 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22.
- [14] 倪根金. 救荒本草校注[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8: 1.
- [15] 忽思慧. 饮膳正要[M]. 李春方, 注译. 北京: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8: 2.
- [16] 倪瓚. 云林堂饮食制度[M]. 邱庞同, 注译. 北京: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8: 43.

## An investigation of ancient diet in the bibliographic respective

FU Mingyi, TIAN Fujun

(School of Humanities,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Ningxia 750021, China)

**Abstract:** The classification of ancient books about diet experienced a process from chaos to union, since the first setting of catalogue of “charts and recipes” in “Suichu Hall Booklist” edited by You Mao in Song dynasty to that in the index of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Dietetics books shifted from the “history” branch to the “Zi” (referring to the ancient philosophers) branch and distributed mainly in the divisions of farming, medicine, and charts and recipes. The refinement and stability of the classification books about diet demonstrated the independence of dietetics. The compilations of diet writings in various times were the same.

**Key words:** bibliography; diet; classification; Zi

(责任编辑: 王雪萍)